

探索新形势下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的石窟寺保护新路径

——“国家文物局石窟寺保护技术培训班”活动综述

焦建辉 马洁怡

11月20日至23日，“国家文物局石窟寺保护技术培训班”在洛阳龙门石窟举办。此次培训班由国家文物局主办，龙门石窟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共有50余名来自全国各石窟寺保护管理机构的专业人员参加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与实地教学并重、交流分享为辅的授课模式，来自石窟寺保护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为参训学员全面讲授石窟寺保护理念、实践案例、工作程序、新技术和新成果等内容。

为期4天的培训，课程涵盖石窟寺面临的岩体失稳、水害、风化等主要病害类型，涉及日常维护、监测预警、勘察研究、病害治理等石窟寺保护不同环节，对石窟寺保护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对不同阶段的保护理念进行了梳理总结，对目前采用的各种病害治理技术措施和实践案例进行了系统介绍评估，也对新形势下石窟寺保护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解决路径进行了深入思考。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郭青林以《中国石窟寺保护历程》为题，以我国石窟寺赋存环境和石窟寺保护存在的稳定性、风化、水害等主要问题为背景，梳理了不同历史阶段我国石窟寺保护的主要任务、重点工程和理念变化，重点以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为例，分享了多年来敦煌研究院在保护技术攻关、重大示范工程、监测预警体系、微环境控制研究等综合保护管理体系建立方面的实践成果和成熟经验。

复旦大学教授王金华以《新形势下我国石窟寺保护深层次问题与解决路径的思考》为题，归纳了我国石窟寺时空分布、密集分布区气候、古沉积环境等方面的区域特征，回顾了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型石窟寺保护工程案例及这一历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三次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列举了防护工程措施与文物保护原则的冲突问题、文物保护原则的理解与实践问题、文物保护材料引发的衍生破坏等突出问题，明确了我国石窟寺风化病害分级标准及评估、水害渗流路径的精细探测、保护材料体系设计和新材料研发、保护工作效果评估等亟需破解的关键技术，提出了构建以区域性石窟寺保护为支撑的石窟寺保护体系的思路。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以《石窟寺保护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为题，分享了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过程和感悟，梳理了我国石窟寺基本概念、保护历程，阐述了石窟寺保护主要科学技术问题，并介绍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石窟寺岩体稳定性预测及加固技术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国传统石灰材料的微纳改性工艺、改性材料的浆液和固结性能、功能材料的调控机制、现场灌浆模拟实验、材料性能建议指标等创新点，强调了科技创新对石窟寺保护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研究员严绍军以《石窟寺勘察技术》为题，分析了工程勘察与

文物勘察在对象、内容、成果、原则目的与阶段划分等方面的区别与联系，从工程测绘、物探及工程坑、槽、钻探三个方面介绍了石质文物勘察工作的基本方法，并以龙门石窟潜溪寺水害治理工程为例详细介绍了石窟寺勘察技术手段、工作程序和宝贵经验，为学员指明了石窟寺前期勘察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谢振斌以《石窟寺病害特征与成因分析》为题，介绍了四川石窟寺及摩崖造像概况，分析了病害类型多样、缺乏统筹规划及人才、经费缺乏等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以石窟寺风化病害为重点，对四川石窟风化病害成因进行分析研究，以乐山大佛为例介绍了四川砂岩石窟风化程度、风险预测模型研究等风化病害定量评估方法与指标体系的探索，为川渝地区石窟寺风化病害治理工作提供了借鉴。

上海大学教授黄继忠以《石窟保护中的水问题研究》为题，聚焦石窟寺水害问题，介绍了影响石窟寺保存的水的不同类型及来源，从物理、化学、生物等角度分析了水对石窟寺产生的严重破坏作用。在对乐山大佛、龙门石窟、大足石刻、云冈石窟等石窟寺留存的水害治理工程案例，讲述针对不同类型的水所对应的治理措施，为一线人员研究、治理石窟寺水害提供了参考。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于宗仁以《石窟寺壁画、彩塑无损探测与健康诊断技术》为题，介绍了石窟寺壁画、彩塑保护原则和基本工作程序，详细列举了壁画、彩塑面临的起甲、龟裂、粉化、颜料层脱落、裂隙、褪变色等主要病害类型特征，讲述了原位无损探测方法与探测的应用背景，列举了相关技术设备、检测方法及应用成果，并结合莫高窟的保护实践，阐释了原位无损分析方法体系构建及应用。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郭宏以《壁画保护修复理论与实践》为题，以新疆龟兹石窟壁画保护实践为例，从环境调查、壁画制作材料与工艺、病害类型和机理研究、修复材料与工艺筛选、壁画保护修复等方面，系统介绍了石窟壁画保护修复的理论、展示了清洗污渍、起甲回贴、空鼓灌浆、酥碱修复、脱落边沿加固、地仗裂隙修补、清除失效材料等壁画典型病害修复工艺和流程。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建群以《石窟寺保护工程实践》为题，以安岳圆觉洞石窟抢救性保护(一期)工程、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摩崖造像保护修缮工程和大足石刻、龙门石窟、安岳石窟水害治理工程为例，介绍了岩体加固、本体保护修缮和水害治理等石窟寺主要病害类型的保护工程实践经验，为一线保护研究人员提供了参考借鉴。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王菊琳以《材料学在

石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为题，从材料学与化学的关系、材料学分支学科、材料学基本理论等方面，系统梳理了材料学的基本概念及理论，提出按物质材料组成分类的文物保护材料的分类方法，在此基础上对文物保护基础理论及模型、文物材料学、文物保护材料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并以大足石质文物保护工程材料筛选实验和评价研究为例，阐释了材料学在石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实践。

兰州大学教授张景科以《石窟寺监测方法和技术》为题，聚焦岩体变形监测，分析了适用手段有限、整体监测不易实施等当前石窟寺监测难点，阐述了边坡监测、地下工程监测、文物监测、石窟寺监测的发展现状，以庆阳北石窟寺和安岳圆觉洞岩体变形监测为例介绍了石窟寺岩体变形监测的技术与方法，提出通过窟内三维扫描、窟外航摄来获取岩体结构信息并加入模型进行预测分析的石窟寺岩体稳定性分析研究新思路。

实习阶段，全体学员在龙门石窟一线保护人员的引导下，观摩龙门石窟保护工程现场，了解石窟保护的“龙门模式”。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马朝龙以《龙门石窟日常维护》为题向大家讲述了龙门石窟保护工作，列举了龙门石窟遭受的结构失稳、水害、风化等主要病害，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开展的保护工程，重点介绍了日常维护工作开展情况，分享了以天然石灰岩为材料的窟檐修复、窟龛局部缺失修复及3D打印修复局部坍塌洞窟等“小干预、大效果”的日常维护实践探索。

学员们一致认为，此次培训时间安排紧凑，课程设置科学，师资力量强大，学习内容丰富多彩，通过培训对我国石窟寺保护工作的艰辛历程有了整体认识，深刻理解了不同时期石窟寺保护的理念变化，对石窟寺保护的实践方法和工作程序有了更加全面的认知，对石窟寺保护关键技术攻坚方向有了初步了解。学员们纷纷表示，扎根一线保护好石窟寺的本领得到提升，工作信心更加坚定，返回工作岗位后，要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好好运用，丰富实践，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石窟寺类文化遗产。

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洛阳市文物局、敦煌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等单位相关人员出席开班和结业仪式。结业仪式上，国家文物局石窟寺保护工作相关负责同志对我国石窟寺文化遗产类型特征、地质石质条件、法律法规和管理机构建设、重大保护工程等进行了全面梳理，归纳总结了我国石窟寺保护理念探索、发展、成熟、科学化四个发展阶段，对不同发展阶段石窟寺保护的主要任务、保护理念、典型案例进行了详细讲解，重申了“以石窟寺价值阐释—监测预警—环境控制—灾害治理—保护修复”为一体的石窟寺综合保护理念，并对新时代石窟寺保护工作提出要求。

《出动中的新四军》：新四军东进抗日的见证

张玉文

《出动中的新四军》书宽13厘米，长18厘米，孜莱著，1938年5月由武汉汉口群力书店出版。现藏于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书的封面上印有一名抗日战士，战士右手高举步枪，左手手掌张开放在嘴边，口作呐喊状，一种号召抗日，冲锋向前的形象跃然纸上。

书的封面和扉页上各盖有“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赣办事处”公章印鉴，因为该枚印鉴的珍贵，这本书被赋予了重要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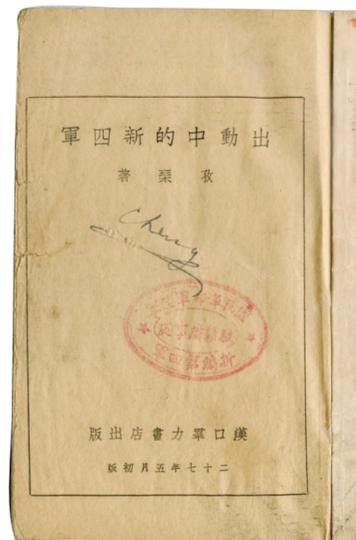
记录历史 东进抗日

《出动中的新四军》一书反映了新四军东进抗日，沿途队伍宣传抗日主张、军民鱼水情深的场景，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以及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较重要影响。全书共84页，内容分为誓师大会、行军到东门、疯狂了的慈化民众、争取老百姓回家、第一次登上火车、从杭州逃难来的戏班子、北伐以来前所未有的军民联欢大会、他们在忏悔、我要去当兵、你们有什么秘诀、待机出击等十一个章节，记载了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在平江县嘉义镇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后，开赴皖南抗战，沿途宣传抗日、动员群众、军民联欢的行军过程。

抗战初期，新四军改编组建、开赴抗日前线过程中，困难重重且时间紧迫。然而，英勇的南方红军游击健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时两个多月完成了下山改编、开赴抗日前线的艰巨任务，创造了我军创建史上的一大奇迹。如张瑞丞在《新四军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着》一文中所说：“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的事情，任何其他部队所不能做到的奇迹。”

《出动中的新四军》一书记载了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底集中到湖南省平江县嘉义镇一带进行改编任务。1938年1月，部队改编成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团长由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傅秋涛兼任。1团下辖3个营，改编期间人数扩充到1100余人。1938年2月初，部队奉命开赴皖南抗日前线。2月9日，部队出发前召开誓师大会，周围几十里的群众赶来参加并洒泪送别。2月10日，部队从嘉义镇出发，步行经长寿街、浏阳市的东门、达浒、文家市等地到达江西宜春市慈化镇。部队原计划从宜春(袁州)上火车，后因情况有变——国民党军队在宜春市集结两个团兵力，有消灭新四军这支部队的企图。得知消息的新四军1团改至萍乡县休息一晚，然后从萍乡上火车。火车途经宜春未停，经一昼夜到达江西玉山县，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部队在玉山县下车后，继续步行，经浙江的常山县到达开化县。3月初，部队顺利到达安徽歙县境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赶往岩寺集结的任务。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在沿途行军过程中，一路宣传我党抗日政策，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还征召了一批新兵入伍，扩大了新四军在群众中的影响。

《出动中的新四军》一书出版时间离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完成行军任务仅两月。此书第一时间记录了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的行军情况，是一部战争年代罕有的记载新四军改编组建、开赴抗日前线的纪实书籍。因此，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看，该书都实属珍贵。



《出动中的新四军》封面和扉页各盖有“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赣办事处”公章印鉴

协助运送 为国纾难

在书籍的封面和扉页上共盖有两枚“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赣办事处”印鉴，这充分说明，此书曾被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赣办事处(简称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收藏过。1938年1月6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南昌市西湖区东书院街成立，由新四军少将参谋黄道任办事处主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在南方国统区内公开合法的总机关，归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机关设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内，由办事处掩护。东南分局的同志对外统称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1938年4月4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后，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并未随军部离开南昌，而是留下继续开展抗战工作。1939年3月，由于日军进逼南昌，办事处撤离南昌，后经吉安辗转至上饶。1941年1月初，办事处结束使命，撤离上饶。新四军驻赣办事处驻南昌期间，积极协助新四军各部队开赴皖南集中。1938年1月，办事处联系到了上海煤业救护队，将运送新四军去皖南岩寺的任务交给他们。当时负责湘鄂赣边区新四军运送任务是王公道带领的煤业救护队分队。王公道率领煤业救护队人员，夜以继日地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数十次运输，从未出过事故，完成了从国统区运送新四军伤病员和物资到岩寺的任务，为新四军的建军和东进抗日作出了巨大贡献。运送任务完成后，上海煤业救护队员在岩寺集体加入新四军。

岁月如梭，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公章至今未被发现，而《出动中的新四军》一书中所留下的两枚公章印鉴，成为证明办事处公章曾经存在过的唯一证据。同时，这本书也成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江西开展抗日运动的见证。

天真幽淡见真质——八大山人《幽溪载酒图》读记

陈薇



《幽溪载酒图》八大山人 纸本设色 八大山人纪念馆藏



《幽溪载酒图》八大山人写款识

《幽溪载酒图》现藏于八大山人纪念馆，二级文物，纸本设色，纵172.5厘米、横53厘米，款：“八大山人写”(右上角)，印：“可得神仙”(白文方形印)(印残缺)、“拾得”(白文长方形印)(右上角)，“何园”(朱文方形印)(右下角)另有收藏者印三方，留口书屋、南山口口，余略。画面上部绘远山，几笔淡墨，朦胧缥缈；中部绘大树草屋，两峰夹道，鲜有人踪，数间草堂，多有书香；下部是小溪，一老者在溪中泛舟，晒船载酒。画面墨色无过多浓淡层次，却整体空灵，处处以虚带实，笔笔意气相接。此作为八大意境升华期作品，注重神韵，渐入化境，给人以朴素、宁静、天真、恬淡的佳境。该文物曾于1989年10月赴武汉参加全国文物鉴定，专家谢稚柳评论：“款好，画亦不错。”刘九庵则评：“‘写’字规矩，约77、78岁，惜画黑。”

八大山人现存世最早山水画，是在1681年作《绳金塔远眺图轴》，其55岁时所作，当时八大山人弃僧画山水，风格较为简洁，意境孤寂；在1693年前所见山水尚未成熟，1693年八大山人68岁后，是其山水画的创作旺盛期，虽然八大山人取法董其昌，又上溯董源、米芾、黄公望、倪瓒等，成熟时期的山水犹如他的书法一样，他题临某人画，如常题：“玄宰笔意”“仿北苑”“仿大痴笔意”，却是间接地窥见古代山水画家，进行个性化的再创造。如临摹董其昌的六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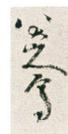
页临本，册页上未题八大山人的名款，只落“玄宰”与八大山人印章，已然八大山人自家风貌，虽有题调亦有荒凉之意，但多以湿笔写出茂盛之气。1699年以后，八大山人的笔性变化幅度较大，力求天人合一的“天真幽淡”的意境，多见于笔枯墨的荒寒意境，以渴笔为主，多以倪瓒为宗。

《幽溪载酒图》是典型八大山人山水的晚年面目，以渴笔枯墨的荒寒之境，具有倪云林的简约宁静，为1699年后的山水风格；可得神仙、拾得、何园为八大山人晚年印款，“可得神仙”1684—1705年使用；“何园”为大何园印，1689—1705年间使用；“拾得”1699—1705年使用，从山水风格及印信息可知为八大山人74岁(1699年)以后的作品。自八大山人69岁时，其款：“八大山人写”中的“<>”基本改用“八”样，“写”字规矩。款识：“写”出现于1694年以后。最早“八大山人写”出现于浙江省杭州西泠印社藏《书画册》，在甲戌年(1694年)以前，八大山人的题识多为：仅落款“八大山人”“八大山人画”“八大山人临”“八大山人画并题”，早年则落款：“驴书”“人屋”“驴屋驴书”“传蔡”“个山”“广道人题”“灌园长老题”等。而“八大山人写”的“写”轨迹亦有迹可循，据八大山人作品上题识“八大山人写”有详细年份记载作品中所见，如：浙江杭州西泠印社藏《书画册》(1694年)、江苏苏州灵岩山寺藏《杂画册》(1695年)、上海博物馆藏《花果册》(1697年)、上海博物馆藏《书画合装册》(1699年)及同年的王方宇旧藏《花鸟册》、大风堂旧藏《花鸟山水册》(1700年)及同年的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松树双鹿图轴》、故宫博物院藏《松鹿图轴》(1701年)所出现的八大山人写的题识中的“写”多为行草，而上海博物馆

藏《花鸟册》(1705年)中的“写”字规矩，不再是以以往行草连笔之风。根据《幽溪载酒图》中的题识“八大山人写”的“写”字规矩，故可推断此件作品在1702年至1705年之间，在他76岁至80岁之间。正如前文刘九庵鉴定笔记中所述。

这件文物整个画面描绘荒无人烟的荒山剩水，中部的松树歪斜，枯枝败叶，八大山人山水画几乎不画点景人物，在八大山人存世作品中鲜少有画面见人物陪衬，虽前景渔隐垂钓给画面增添生机，但整幅作品仍保持意境荒寂基调，在苍茫远境中透出雄健浑厚之气。整幅作品不拒成法，干笔枯墨，多见渴笔，树枝歪斜，看似不顾法度，信笔草草，却有顿挫转折，如绵里藏针；八大山人用笔苍秀而劲健，施以中锋，侧峰皴擦居多。在构图上，前景的泛舟偏于左下方，中间贯以松石，与上部的山峦相连，呈“S”形之势，彰显生命的升华感；在章法布局方面，在大疏中有小密、大密中有小疏，画上部虚而中下部实，两座夹峰突兀而上，相互穿插，直上画面顶部。上部极少笔墨于皴擦，以空白处补以意，虚实相生相发。《幽溪载酒图》运用了浓墨干笔、渴笔皴擦的“毛”的意味，山水间大量留白，使得整个画面透露天真幽淡，把倪云林的简约疏宕之气推向了一个更纯净的高度，苍茫老辣而简约明洁，在荒寒孤寂的画风下透露出豪迈迈雄放之气，故八大山人将倪云林的“天真幽淡”更为“真质”，形成自我风貌的简

笔画风。在明末清初，以“四王”为首的摹古画坛风气之下，八大山人的山水画能“师古”又能“师造化”，“师心而不蹈迹”。既能观山水之变，又能从董其昌的画法中化出，以“南宗”董源、巨然为宗，晚年以倪瓒为宗。在深厚传统的滋养过程中，不断创新、独树一帜，创造性地走出前人，不再是自然的模仿者和传统的成法，是自我人生经历和心灵世界的写照。正如方闻先生所说：“八大山人从明末写实主义的樊篱中一跃而出，转而临摹古代大家，把绘画转化为独立、奔放甚至狂诞的书法线条体系，同时他把诗人的热情与幻想摄入绘画中，升华为绝对性、全面统一的绘艺。”他的山水，笔墨上有时用险笔，可是一点也不觉突兀，并且大块文章取诸自然，又与古人“真山水”的道理不谋而合。



《书画册》1694年 西泠印社藏



《杂画册》1695年 苏州灵岩山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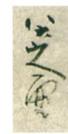
《花果册》1697年 上海博物馆藏



《书画合装册》1699年 上海博物馆藏



《花鸟册》1699年 王方宇藏



《花鸟山水册》1700年 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花鸟山水册》1700年 大风堂藏



《松鹿图轴》1701年 故宫博物院藏



《花鸟册》1705年 上海博物馆藏



《花鸟册》1706年 上海博物馆藏

“八大山人写”款识